

关于黄新波的几张照片

——1930年代后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
艺术活动断章(三)

[日]小谷一郎 王建华 译

六

房州馆山有日华学会和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共同经营的海水浴设施等,中国留日学生一到夏天就到馆山避暑,夏季到馆山度假已经成为习惯了。据我所知,东京左联成员到房州馆山拍摄的照片,除了《日华学会报》等的“公共”照片以外,至今为止发现三张。第一张是被姚辛编入《左联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林焕平等5人穿着游泳衣所拍摄的照片。从林焕平患结核疗养院入院的时间来看,所谓“1934年夏”的照片可能是指这张照片(即“照片8”)。第二张、第三张出现在周一川的论文《关于南京国民政府在日本留学——1928—1937年》^①中。据周一川的照片注释说明,这两张照片是从与东京左联相关的李云扬、伍乃茵夫妇那里得来的。

如果试着比较“照片8”与接下来的第四张照片(该照片也被编入《左联画史》)以及周一川论文所刊的照片,可以看出那时候中国留学生的“避暑”情形。他们在各自保持联络的同时,又以自由组合的形式去避暑,没有什么特别的组织形式。他们以正当的理由离开东京,也是在规避日本警方的监视,或者说,在看似自由



照片 8: 东京左联盟员在房州海边, 左起: 林和济、蔡北华、陈北屏、林蒂、陈子秋、丘东平、黄新波、陈仰哲 1935 年 8 月

的避暑的形式下,说不定包含了有目的性的行动。^②林焕平也说,1935 年的夏天热得很厉害,很多留学生早早地出去避暑了。一些留学生在 7 月初就去房州馆山了。^③

在“照片 8”中,除了陈北屏的籍贯还不确定,其他的全都是广东籍的。拍摄的地点是房州馆山北条海岸,他们是各自组合承租海边的“海之家”形式避暑的。最左边的是林和济,有关他的情况在前文所引用林望中的“回声”中出现过,^④其中有:“东京左联支部中还有冯俭南(笔名马魁夫)、林和济两位。冯因违犯组织纪律被处分不服,自动退出组织,林同情他也跟着退出组织。冯后来在广东汕头病逝,林现在缅甸”的记载。冯俭南(即马魁夫)的名字偶尔能在相关资料中见到,林和济的名字在这以外就没有被提及了。其次是蔡北华,出生于 1916 年,广东省中山人,本名叫蔡冷枫,他给《诗歌》寄稿,是李华飞等人的文艺同人杂志《文海》的成

员。蔡北华 1935 年 5 月来日本的。蔡北华在 1935 年 10 月 10 日发行的《诗歌》第 1 卷第 4 期中,用“柳岸”的名字发表描写贫困渔夫生活的诗《渔夫》,该诗的末尾注“35.8.9 于房州”。《渔夫》可能是他在房州玩的时候的吟作。在旁边的身材有点魁梧的陈北屏,有关他的事目前未掌握任何资料。接下来的林蒂、陈子秋(陈紫秋、陈秋焕)前文已经谈及。旁边的丘东平,1910 年出生,广东省梅县人。1935 年春来日本的,当年 8 月从房州北条海岸回东京后认识了郭沫若,他将在《大公报》上发表的小说《沉郁的梅冷城》送给郭沫若,请求指教。^⑤在黄新波旁边的陈仰哲,是黄新波就读山台中学和上海侨光中学时的同学。1934 年春,他和林为梁、黄维克等一起来到日本的,在日华学会学报部编《昭和 10 年 6 月现在留日学生名册》(东亚学院)的事项中记录:“陈仰哲 二〇 广东 台山 专一ノ二 上海侨光中学 自费”。所谓的“专一ノ二”也就是“专修科一年的第二组”。

他们在馆山时,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林焕平吐血、入院,还有一件是聂耳的死。关于林焕平的吐血的事已经叙述过了。在这里只想说说有关聂耳的死因。

聂耳作为青年音乐家被人所熟知,他 1935 年 4 月到日本,7 月 14 日在神奈川县鹄沼海岸在海水浴中淹死。聂耳 1912 年出生,云南省玉溪人,1935 年 4 月来日本留学,4 月 18 日到达东京,寄宿在同乡张鹤(张天虚)的公寓,聂耳随张鹤等人带领观看了一系列的文艺演出。如,日比谷的新交响乐团演奏会(4 月 22 日),东宝剧场的宝塚少女歌剧(4 月 23 日),新宿第一剧场的松竹少女歌剧(4 月 24 日),神田一ツ桥礼堂由留学生们举行的中华同学新剧会第一次公演曹禺《雷雨》(4 月 28 日)等。留学生们都知道青年音乐家聂耳的名字,他作曲的《渔光曲》、《大路歌》等都是知名曲子。不过,很多留学生只闻聂耳其名不认识其人。聂耳出席了 6 月 2 日在神田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举行的第 5 次中国留日学生

的“艺术聚餐会”，他一人作了二小时以上《最近中国音乐界的总检讨》的演说，亲自演奏演唱自己所作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等曲子，显示了年轻人的朝气，他本人也瞬间融入留学生中间，受到了欢迎。聂耳还先后出席了蒲风等组织的“诗歌座会”（4月22日），远地辉武举办的“诗精神”座谈会等。^⑥



照片 9: 黄新波 (前排左起第六) 与左联的朋友在日本房州举行了聂耳追悼大会后留影 1935 年 7 月

如此看来，聂耳到房州与留学生一起避暑的事情，应是有计划安排的。但是，聂耳已安排与日本的新协剧团大阪公演同行，所以伊文说的 7 月 20 日应该是他们约定在房州汇合的日子。^⑦虽然在“照片 3”的照片中没有出现当时的东京左联的其他人员，但是，这时候杜宣、吴天、伊文、蒲风等已聚集在房州馆山。吴天带来吉他打算请聂耳弹，他们期待聂耳的到来。^⑧伊文在 7 月 18 日首先从友人那里得来的消息，然后通过《朝日新闻》的报道确认了聂耳的死讯。^⑨蒲风是 19 日知道的这个消息的。^⑩大家都被这个消息震撼了，他们在房州馆山召开追悼会。据 1935 年 10 月 30 日伊文写的追悼文《记聂耳》：追悼会在馆山海岸中华青年会的小礼堂举行，中国青年出席的人数超过百人，挽联、散文、诗歌等挂满了整个礼

堂,来宾们悲愤激昂的演说,合唱聂君的纪念作品,歌声烘托着会场庄严悲伤的气氛,追悼会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他们决定出版聂君的纪念集,在会场募得资金五六十元(实际收到约 40 元)。^①东京聂耳纪念会编的《聂耳纪念集》于 1935 年 12 月 31 日出版,该书《编后》中“接受各方面友人的心意,艺术聚餐会的召集人杜宣筹划了聂耳的追悼会,并成立纪念委员会。杜宣任总务,学书任助理,伊文任会计,推选与聂耳生前比较接近的黄风兄担任编辑工作。”^②

黄新波为装帧《聂耳纪念集》到留学生中走访,创作了《聂耳纪念集》封面木刻《聂耳像》,刻画了手拿吉他的聂耳的形象,并投寄追悼文《致亡友》。《致亡友》是黄新波听到聂耳死讯后的 7 月 23 日在房州写的。^③在《聂耳纪念集》中,“照片 8”中的其他人也写了纪念文章,林蒂写了评论《纪念聂耳的意义》,陈子秋(紫秋)写了诗《忆聂耳》,蔡北华(柳岸)写了纪念文《并非照例》。

七

我的发掘文章也将近结束了,这里再举出几张黄新波在日本留学时代拍摄的照片。

“照片 10”的说明为:“在日本东京 1935 年”。这张照片中的黄新波,穿着长袖衬衫、西服、戴着领带,左手靠在栏沿。照片左边为坐着的男性,同样是戴着领带,穿着西服,戴着帽子。根据穿着推测照片是在夏天拍摄的,帽子应是遮阳的。照片后方的远景模糊,他们看上去正乘着船,好像小船还开着。联系到前文“照片 6”,^④“照片 6”的说明是:“于上野公园 1936 年 6 月 12 日”。这张照片前面第三位(右起第三位——译者),他的服装,如果给这位另外再配一顶帽子的话,应与“照片 10”戴着眼镜的那个人完全一样。还有,黄新波的服装及领带也和“照片 10”是一样的。如此,



照片 10:在日本东京 1935 年

只能考虑这两张照片是同时拍摄的。但是,两张照片记录的时间不同,一张照片说明是“1935 年”,另一张却是“1936 年 6 月 12 日”。当然,以上只是根据我的主观判断,还没有得到黄元先生的确认。但是,如果“照片 6”、“照片 10”是同时拍摄的,那么该照片的“说明”必须是“1935 年”拍摄的。^⑮我认为这两张照片不一定同时在上野公园拍摄的,如果照片显示的是在上野公园的不忍池坐小船。我曾经专门去了上野公园,试图从照片的背景、景色进行了探索,但是无法从现在的上野公园中得到什么发现。前文已经说明黄新波是在 1936 年 6 月下旬回国的。^⑯那么“1936 年 6 月 12 日”就是黄新波回国之前了。“照片 6”中在一起男女 6 人,如果包括摄影者,那么共 7 人,我现在无法搜索到相关的资料,以叙述当时他们聚集在上野公园的具体情况。



照片 11:于日本石神井 1936 年 1 月

“照片 11”的说明是“于日本石神井 1936 年 1 月”拍摄的。照片是在石井公园内有神社的鸟居前。我想是不是在正月期间拍摄的,不过,我目前无法获得更多的关于这照片的资料。“照片 12”和“照片 13”都是在早稻田大学内拍摄的。“照片 12”是“1936 年 3 月”拍摄的,场地在大隈重信像前,台座的周围积满了雪,背景的房屋屋顶上隐约看上去很白的一层雪,黄新波穿着大衣,右手拿着帽子,左手拿着好像是用布卷起来的東西。“照片 13”是“1935 年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照片的人物:左边是钟文光、中间是黄新波、右边是邓克强。我是从黄新波、邓克强的关系中知道钟文光这个人的。钟文光的名字没有在东京左联的机关志以及相关资料中出现过。但是,在日华学会学报部所编的《昭和一〇年六月现在留日学生名册》(明治大学)的记录中,有他的姓名、年龄、省、县、学部科年级、原籍学校、学费等事项:“钟文光、二四、广东、东莞、



照片 12: 于日本早稻田大学 1936 年 3 月



照片 13: 黄新波(中)与邓克强(右)、钟文光(左)
在东京早稻田大学 1935 年冬

政经学部一年、香港华大学院、自费”。由此看来，钟文光和黄新波同是广东省籍的，他那时是明治大学政经部的学生。钟文光和1935年12月25日发行的《学术界》复刊号的“编辑代表者”陈士廉（广东台山）以及黄新波的台山中学的同学黄维克同在明治大学政经学部，他们是同年级的同学。在日华学会学报部所编的《昭和一〇年六月现在留日学生名册》（明治大学）的记录中也有邓克强的事项：“邓克强、二四、广东、惠阳、高等专业科、中山大学法学院、自费”。在我之前写的文章中，“丁克”（即邓克强）的名字是在介绍1935年10月举办的“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时涉及的，他的摄影作品在那次展览中展出，他和黄乃、陈紫秋、梅景铤一起在中垣虎儿郎那里学习世界语，和黄维克一起作为1937年4月发行的《学术界》第2卷，第2、3期“编辑代表者”。在东京的广东省籍留学生相互友好的往来。不过，在看到“照片13”之前，我还不知道黄新波和邓克强有那么亲近。一些资料说明邓克强在日本留学时代比较俭省贫穷，从照片看他的衣着可以同意这种说法。但是，他不介意自己贫穷，看他脸上的表情，散发出青春灿烂的笑容。

我在看这些照片时候注意到一件事，那时黄新波为什么频繁地去早稻田玩呢。检索手上的资料，这其实是与“三闲庄”、“未名庄”关联的。我前文所引述的魏猛克信：“梅景铤同志曾经住池袋三丁目(?)‘三闲庄’旁边不远的一所房子里。是同几个广东青年合住，记不得是不是与陈子秋等合住了。”^⑧信中提到的“池袋三丁目”，与现在的地图对照来看，是在立教大学后面，靠近北池袋一带，从那里去早稻田很近。“三闲庄”“未名庄”也应该在池袋那一带吧，遗憾的是，至今我还没有去做最后的确认。

八

“照片14”、“照片15”都是1935年10月举办“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的会场拍摄的。“照片14”的说明为：“中



照片 14: 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美展之木刻作品部分 1935 年秋



照片 15: 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的美展会场 后排左二为黄新波 1935 年秋

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美展之木刻作品部分 1935 年秋”。“照片 15”的说明为：“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在东京文房堂举办的美展会场 后排左二为黄新波 1935 年秋”。

从黄元先生提供的照片中,最让我吃惊的是在这些照片中,我发现众多的与“习作展览会”“美术座谈会”相关的人的脸。这些照片给予我充满想象的空间,但我目前没有时间去一一整理。我回国后,将这些照片的拷贝送给奈良和夫先生。奈良先生感慨而深切地说:“这样的照片也出现了吗”。这些照片是如此地震动我,我通过这些照片明白了许多事情,所以心情很激动,遗憾的是我现在只能略谈与照片有关的事情。

如前所述,“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从 1935 年 10 月 8 日到 10 日在东京神田的东京堂书店的二楼画廊举办。东京堂是在 1929 年 12 月新店铺竣工的。“一楼百余平方米是商场,二楼除了办公室、仓库、食堂、小使室等外,全部是画廊”。会场在东京堂的二楼有二间房间作为展览厅。^⑩

说起东京堂的二楼画廊,1934 年 6 月 12 日到 21 日在上野的东京府美术馆举办的“中华留日学生美术展览会”时,展场的对面所贴有“中华留日作家十人展”的广告。由广东籍的画家方人定、赵兽、梁锡鸿、李仲生等的“中华留日作家十人展”,是在 1934 年 7 月 31 日到 8 月 4 日举行,地点就是在东京堂二楼的画廊。^⑪其中,参与东京左联重建的魏晋的妻子曾奕也参与了这展览。

梁锡鸿、李仲生、曾奕他们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绘画研究所的同事,他们曾参加 1932 年 9 月在上海美专举办的“美专绘画研究所展览”。在这次“十人展”之后,1935 年 1 月 10 日,他们在日比谷的山水楼颂扬“超现实主义”,成立了“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关于这事在蔡涛的《梁锡鸿:被遮蔽的风景》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蔡涛原是广州美术馆馆员,现在是广州美术学院的教师,他现在除了收集整理被称为“幻想的画家”王道源的作品以外,也收集有关曾

奕的资料,同时,着力于“中华独立美术协会”的研究,我期待他的研究成果的出版。2013年3月我走访广州之际,蔡涛先生做向导,使我在广州美术馆看见很多王道源的作品,同时得以拜读广州美术馆和广州美术学院藏的资料。在此,我对蔡涛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照片14”展现了“中华美术座谈会第一次习作展览会”木刻展示区一角。我猜测这个“习作展览会”是个小型的展览会。从照片看横排着装入画框展品,可以看出展厅显得很宽敞。“照片15”与“照片14”是同一个会场,是他们拿来长椅子放在会场中来拍摄纪念照片。“照片15”中,前排三人,中排的一人手搭在前排沙发上一人的肩上,后面三人站着。后排左面第二戴着领带、穿着西服的是黄新波。该照片一共9人,除了黄新波以外,其他人就不甚了解了。当时为“习作展览会”提供作品的有26人,可以确认照片中的9人当时都在日本留学。现在将参展的26人的名字重新列出,展览会的作品展示分为六个部分:摄影部分参展者为丁克(即邓克强)、卢势东;油画部分参展者为陈业贤、石天、宗典、沈苇、伊文、陈学书、顾洪干、吴启瑶;木刻部分参展者为陈烟桥、罗清桢、黄新波、郑野夫、沃渣、伯人、戴隐郎、张慧、杨荆石、郝丽春、温涛、段干青、唐英伟、杨堤、胡其藻;铜版部分参展者为顾洪干;水彩部分参展者为吴启瑶、伊文、曹景周;素描部分参展者为宗典、陈学书等,共26人。其中能够确认在日本留学的有:卢势东、陈学书、陈业贤、吴启瑶、曹景周、丁克、顾洪干、黄新波、伊文共9人。顺便说一下这9人的所属学校:东亚高等预备校生的卢势东(27“专一之八”)、吴启瑶(32“专一之二”);日本大学专科部文科艺术专业的陈学书(21该专业2年)、陈业贤(21);川端画学校石膏部的曹景周;明治大学政经学部高等专业科的丁克(即邓克强)(24);顾洪干、黄新波、伊文所属学校虽然还不能确定,但是他们三个人全部向《聂耳纪念集》投了稿,可以确定他们当时在日本。

“照片 15”中穿着西装的是黄新波、后排右边的一人、前排左边的一人，剩下 6 人全部穿着学生装。学生制服、学生制帽等一些线索不是给我们想象空间了吗，遗憾的是，现在还是无法确定什么。即便如此，如果排除照片中的“9 人”一起合影偶然性，那么，照片中的这“9 人”应是：卢势东、陈学书、陈业贤、吴启瑶、曹景周、丁克、顾洪干、黄新波、伊文等“9 人”。

“照片 16”拍摄的时间是 1936 年。在照片的左侧：“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欢送糜春辉君赴德纪念”，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为将赴德国的糜春辉举行欢送会的照片。我想坐在沙发中间戴着领带、穿着正装是糜春辉吧，但是无法确定。拍摄的照片中包括糜春辉男性 10 人，女性 1 人，共计 11 人。后排左立第二人为黄新波，其他合影者的姓名照片上没有说明。



照片 16：中华留日美术座谈会欢送糜春辉君赴德纪念
(左立第二人为黄新波) 1936 年

糜春辉，出生和毕业时间都不很清楚。他是浙江省上虞县百官镇人，1940 年在邵山牺牲的糜云辉（1916—1940）是他的兄长，

根据张君清的《糜春辉》一文中说糜春辉是在1935年的夏天来日本的。^①糜春辉与东京左联是有联系的，糜春辉的名字是作为“艺术聚餐会”的参加者而出现在杜宣的回忆中的。^②另外，糜春辉和杨任人共同翻译的捷克作家普实克的《现代捷克斯拉夫文学之文坛》译文被刊发在1935年5月15日发行的《杂文》创刊号中。此外，孙铤的回忆《扶桑之行》（《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中比较详细地谈及糜春辉。孙铤，1917年生于上海，曾经在上海大同大学就读，1934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③孙铤和糜春辉是来日后相识的。孙铤和糜春辉相识时，糜春辉和妹妹在神田一幢日本式楼房租了两间二楼大房间。孙铤说：糜春辉的“房间里摆满了油画”，孙铤每次去神田都会去拜访糜春辉。糜春辉带着浙江口音，性格活跃，豪放磊落，总是嘻嘻哈哈的。孙铤和糜春辉经常在神田的夜店散步。^④

孙铤和版画家刘岷也有往来，孙铤回忆说，那个时候他和台湾籍的黄河清一起住在东京中野的川添町三十一番地的北沢太太家，参与了杜宣等主办的留日剧人协会排演《娜拉》的公演。留日剧人协会第一次公演《娜拉》是在1937年1月29日至31日，在筑地小剧场演出的。公演的当天，孙铤在筑地小剧场门口遇见了刘岷，以后他们就频繁地往来。刘岷那时住在高圆寺，从孙铤的住处中野到高圆寺相距很近。一天，孙铤乘高架电车拜访刘岷，刘岷住在二楼，上楼的楼梯吱吱嘎嘎作响，刘岷在“堆满木板的狭小房间里，伏在桌子上抽搐着”。孙铤说“怎么啦？”，他说“想起我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电影，太悲了”。不久，平静下来的刘岷对孙铤谈论苏联的版画，给孙铤看鲁迅送的《引玉集》，并把他和黄新波合编的《无名木刻集》送给孙铤。^⑤

刘岷1915年出生在河南开封县，本名王之兄，字泽长，号慎思，自学木刻，1932年和鲁迅相遇。1934年4月，他和黄新波出版《无名木刻集》，1934年7月到日本。先后在东京帝国美术学院、

现武藏野美术大学油画科学习,师从版画家平塚运一,学习木刻。^⑤有关刘岷留学日本时代和黄新波的往来情况目前无从获知。刘岷在日本的作品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插画(1935年),茅盾《子夜之图》(1936年)等,在东京都杉並区的小野忠重美术馆中,能见到刘岷的一些资料和作品。

再回到糜春辉的话题,很遗憾在孙钿的回忆《扶桑之行》中,没有提到糜春辉德国留学的事情。孙钿是不是出席了“照片16”所提示的“欢送会”,目前尚不清楚,这给我留下了一个悬念。糜春辉去德国留学时间的好像不长,可以确认的是,1937年7月糜春辉返回了日本。

孙钿1937年7月拜访刘岷,在高圆寺车站前的冷饮店谈论着珂勒惠支的版画和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等话题。正在那时,他们听见“号外!号外!”的声音,他们买了张报纸,得知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孙钿第二天一早去神田糜春辉的家拜访,糜春辉对他说“好了,好了,抗战了!亲日投降卖国贼失败了!”于是,他们商量回国的事,决定几天内回国。孙钿告别糜春辉之后前往世田谷拜访了陈仲梧夫妇,约定由他们负责去购买船票。孙钿随返回,作回国的准备。这时刘岷来了,他也决定回国。刘岷告诉孙钿,他最麻烦的是那么多木板。他们约定在上海见面,于是两人交换了在上海的住址就匆忙分手了。孙钿几天后从陈仲梧那里拿到了船票,7月15号从横浜乘船回国。^⑥糜春辉也应该在那时回国的。谈到这里,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作专文谈谈有关卢沟桥事变前后有关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情况。

我认为,从“房州馆山”、“习作展览会”、“糜春辉欢送会”等照片,应该能进一步推断出种种有关留日学生的事迹,我到现在为止尽可能的写出与这些照片相关的故事,也算是对黄元先生赠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谢礼。对我来说,前年的香港,今年3月的广州之行,收获了特别珍贵的礼物。但是,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了其他杂

事,说实在的至今还没有对所得的资料作进一步的分类整理。但我心中仍然怀着最初拜读这些照片时的兴奋,它们有着实质的历史意义。在此,我只想这样表达我的心愿:今后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关注着这些有关这方面的资料的。

(原刊《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第383号,2013年9月29日;第385号,2013年11月24日;第386号,2013年2月27日。原文中所引照片以及照片说明摘自广东省美术协会编:《黄新波纪念文献集》,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译文中部分照片由黄元先生直接提供了“聂耳追悼大会合影”及其他照片的数码版,或摘自黄元的搜狐博客《黄新波的艺术》<http://huangyuan1226.blog.sohu.com>,在此谨向黄元先生表示感谢。)

注释:

- ① 收入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的现阶段》,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版,第218页。
- ② 根据“照片8”中的蔡北华在《回忆东京左联活动》(收入《左联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写到,当时(1935年),东京左联的盟员去房州,其中有:“小说之家”“戏剧之家”“诗歌之家”“美术之家”“世界语之家”等组织成员,还有何干之组织的“社会科学理论之家”展开各种活动。这个回忆在周一川论文(参照注1)中也得到确认的:“左翼的年轻人为了回避警察的监视,暑假期间去房州和伊势海岸‘避暑’,进行集体性的学习活动”。可以如此断言,在避暑中的留学生们寻求展开新的运动的方式也是事实,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是避暑。不过,也不能因此否定他们夏季各个集训的计划。杜宣说:“大家一到那里不想学习,着了迷似地每天在海边闹腾”(杜宣:《永别了聂耳》,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1935年),也不大接近事实。我认为,把他们留学生夏天的活动视为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性”,是不是与事实不相称,太片面了。另外,周一川文中的“伊势海岸”写错了,是“伊豆海岸”。
- ③ 林焕平:《无限感慨》,《质文》第2卷第2期,1936年11月10日。
- ④ 参见张大明汇:《对〈左联成员名单〉(未定稿)的回应》,中国社会科学院

- 文学研究所《左联回忆录》编辑组编：《左联回忆录》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838 页。
- ⑤ 杨淑贤编：《丘东平生平年表》，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7 月；郭沫若：《东平的眉目》，《东方文艺》第 1 卷第 1 期，1936 年 3 月 25 日。
- ⑥ 《聂耳日记》，《聂耳全集》编委会编《聂耳全集》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 年版。
- ⑦ 伊文：《记聂君》，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东京·堀川印刷厂，1935 年 12 月 31 日。译者注：1935 年 7 月 7 日聂耳致孙师毅信中说：“我决定九日和一个灯光专家往富士山，住他家里。十七日起赴京都、大阪、神户参加‘新协’的旅行公演，并参观剧场及摄影场。二十六日起赴四国松山洗温泉，七月底返东京，八月初和云南同乡们赴房州海滨，约九月初回。”《聂耳全集》下卷，文化艺术出版社、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0 页。又，据《聂耳全集》下卷之《聂耳日记》，聂耳 7 月 9 日前往日本藤泽鹤沼海滨的江之岛，并在那里逗留。
- ⑧ 杜宣：《永别了聂耳》，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
- ⑨ 同注⑦。
- ⑩ 蒲风：《“天才损失年”悼聂耳》，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另外，文末注明“一九三五，七，廿二于房州”，说明文章是作者得知聂耳死讯 4 天后在房州写的。
- ⑪ 同注⑧。通过《纪念集》卷末的《募捐者的名册》可知，“照片 8”中的“林和济先生 二元”、“林帝先生 一元”、“黄新波 一元”、“冷枫先生 一元”等。此外，《纪念集》印刷的印刷厂“堀川印刷厂”，是与印刷《杂文》的是同一家印刷厂。
- ⑫ 《编后》，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学书”的就是陈学书，“黄风”的就是蒲风。《编后》文末注明“一九三五、十一、三于中野”。当时张天虚住在中野（参加改书中天虚《聂耳论》）。张天虚在本文中说他与聂耳是同乡，聂耳到东京后就寄宿在张天虚的公寓里。《日记——留东之部》作为“聂耳遗著之一”，收入《聂耳纪念集》，也许这也是张天虚安排的吧。
- ⑬ 新波：《致亡友》，东京聂耳纪念会编《聂耳纪念集》。文末注明：“一九三

五,七,廿三于太平洋之滨”。

- ⑭ 参见《关于黄新波的几张照片——三十年代后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学、艺术活动断章(二)》,《上海鲁迅研究 2014·冬》第 147 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年版。
- ⑮ 根据黄元的搜狐博客《黄新波的艺术》<http://huangyuan1226.blog.sohu.com> 中的《远去的故事(16)——一张令人感慨的照片 1936 东京》(2010 年 9 月 25 日)一文,“照片 10”的说明为:“新波(右)与孙孺,东京井之头公园,1936 年”。文章记述到:“新波历尽风雨、熬过‘文革’的浩劫,在逝世前不久见到这位年轻时的朋友时,高兴地告诉他,他终于找到四十多年前他们一起在日本井之头公园拍的照片了,那时,他们同样面临着被迫离开日本的处境。显然,这是他们一起在日本留下的最后纪念。但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最终也没有交到孙孺的手上,他始终没有看到他们当年意气风发的倩影。”译者注:孙孺(1914—1987),广东省兴宁县人,经济学家。曾任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广东经济学会会长,《南方经济》主编,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理事长等。孙孺曾在 1983 年 3 月 18 日的《羊城晚报》上发表《忆新波》。
- ⑯ 《(黄新波)生涯事迹》,广东省美术协会编:《黄新波纪念文献集》,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8 年再版。
- ⑰ 《魏猛克在东京——魏猛克给林焕平的信》,《新文学史料》1984 年第 4 期。
- ⑱ 大桥信夫:《看东京堂百年的步》,东京堂 1990 年。奈良和夫:《关于在日本首次的中国新兴版画展览会》,日中艺术研究会编《中国版画研究》第 4 辑,2002 年 9 月。
- ⑲ 蔡涛:《梁锡鸿:被遮蔽的风景》,《梁锡鸿:遗失的路程》,岭南美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 ⑳ 张君清:《糜云辉》,中共商丘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编:《中共商丘党史资料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 3 卷人物》,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01 页。
- ㉑ 杜宣:《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的文学活动》,《杜宣文集》第五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
- ㉒ 孙钿:《孙钿自传》,《孙钿诗文集》,宁波出版社 1997 年版。
- ㉓㉔㉕ 孙钿:《扶桑之行》,《新文学史料》1999 年 3 期。
- ㉖ 慧衍编著:《刘岷画传》,同心出版社 2008 年 8 月。